

# 中庸与中道思想比较研究\*

蒲建彬

(重庆师范大学 政治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摘要]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相似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共同的中庸和中道思想,对世界文化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我们建设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有必要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含义、内容、实现途径以及各自对后世的影响这些方面对这一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进行剖析,以充分吸收这一思想的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关键词]孔子;亚里士多德;中庸;中道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1-123-04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伦理思想家和教育家,亚里士多德则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誉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最博学的人物”,二者相近的历史时期分别提出了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中庸和中道思想。作为中国和希腊传统道德的重要精神,两千多年间,深刻地影响和指导着东方和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在我们建设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再次剖析这一人类哲学思想的优秀成果,其思想的精华必将为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巨大的推动作用。

## 一、中庸与中道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总是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制约,并且为一定的经济关系服务的,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又为一定经济关系下的政治制度服务。孔子的中庸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则都与各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孕育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对立性之中,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服务,同时两种中道伦理思想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末年,这是一个新旧交错、动荡不安、礼乐崩溃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在经济上,奴隶制生产关系正在向封建制生产关系变革;政治上,王权已经衰落,政权的控制在逐级下移,旧贵族的没落和新势力的兴起,使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周礼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动荡不安;在思想意识上,一些传统观念已经动摇,另一些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思想正在萌芽。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孔子继承和发展了殷周以来的“中”、“和”的思想,将“中”和“庸”联系起来,提出了“中庸”的概念,希望以此消除犯上作乱,

塑造合乎中庸之道的理想人格,以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社会境界。同时力图以“中庸之道”来调和阶级矛盾,挽救奴隶制危机,实现他“克己复礼”的主张。

亚里士多德所处时代正处于古希腊在政治、军事上逐渐走向衰败的时期,希腊社会的中心雅典经济衰退,两极分化和政治危机使整个社会处于急剧的动乱之中。从外部环境来看,希腊在经历二十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马其顿王国异军突起,并且很快取得了对整个希腊城邦的霸占;在城邦内部之间,古希腊由城邦奴隶制向中央集权奴隶制过度,各城邦之间、同一城邦内的奴隶主之间,以及奴隶主与奴隶之间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面对古希腊的内忧外患与复杂的社会状况,广大人民迫切需要稳定、需要生产、需要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安宁与和谐的家庭生活。如何缓和各城邦之间及城邦内部的矛盾,是当时的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站在中等奴隶主的立场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智者们的“和谐观”,鼓励人们注意品德修养,希望在个体的道德生活和道德行为中寻求情感、欲望、理性的和谐,在社会活动中平衡各种关系,达到社会的稳定。这样,亚里士多德在对各种社会生活的思考中逐渐形成了反对极端、求其中道的思想。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和亚里士多德都生活在奴隶制社会即将崩溃的相同社会背景和相近的历史时代,他们都在竭力维护即将灭亡的奴隶制度。中庸也好,中道也罢,都是要缓和社会矛盾,安定社会,这是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孔子中庸重在行为道德约束和道德修养功能的,告诫统治者按中庸行事协调自己的

\* [收稿日期]2006-09-07

[作者简介]蒲建彬(1978-),男,四川自贡人,重庆师范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伦理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行为。而中道则是运用伦理手段达到政治的目的。在亚氏那里“伦理学是政治科学,它服从于政治。这个政治亚里士多德一般指的就是管理城邦和城邦生活。”<sup>[1]</sup>直接为统治者的统治服务。“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角度来观察的城邦社会关系的模塑品。”<sup>[2]</sup>

## 二、中庸与中道思想的含义比较

孔子的“中庸”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哲理,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对中庸之道极为推崇。他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解释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至,极也,鲜,少也。”<sup>[3]</sup>对“中庸”含义的理解的关键是对“中”的把握,“中”最主要的是表征人的行为,即中正、正确、得当。这应是“中庸”之“中”的本义。《易经》上载“中行独复”(《易经·复·卦辞》),“得尚于中行”(《易经·泰·卦辞》)。这种关于人自身的认识推广到道德领域中,所以尧强调治理社会要“允执其中”。“中则必正,正则必中,中正二名实为一义。”<sup>[4]</sup>“庸”始用于《尧典》,有以下义项:用、常、常道,即对待自然、社会、人生的准则。“中”与“庸”合一,其含义为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其一,中庸是宇宙万物运动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客观规律。《礼记·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谓宇宙万物惟有各得其中,才能相依相生,化生万物。其二,中庸是恰如其分地把握事物,协调矛盾的正确思维方法,中庸阐明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界限,超过或未到达一定的界限都要影响事物的质,势必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事情就不会有理想的结果,它要求人们做事恰如其分,不走极端。其三,中庸也是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和最高道德境界,中庸要求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行为适度,言行得体,不片面、不冲动、不偏执,做事避免“过”或“不及”。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及与之相关的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孔子一样,亚氏把符合中庸的道德规范称之为美德,反对走极端,从两个极端中寻求中正,而这个中正并不是两端的正中点、折中点,而是要达到适合事物正确状态的“适度”与“适中”,也就是“无过无不及”的中间状态。具体来说,中道就是指“在适当时间,就适当的事情,对适当的人物,为适当的目的和以适当的方式产生情感或发出行动”。<sup>[5]</sup>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意志始终面临三种精神状态:过度、不及和中间。前二者都属于恶,只有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第三种状态——中道,才是德性,才是值得称赞的。因此,他指出“德性是关于感受和行为的,在这里过度和不及产生失误,而中间就会获得并受到称赞。这两者就是德性。德性就是中庸,是对中间的命中”,从而得出了“美德在于中道”,“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的结论。<sup>[6]</sup>关于“过”和“不及”,亚里士多德给出了许多例证。比如“关于恐惧和信心,中道是勇敢,而过度是鲁莽,不及是怯懦;关于享受和受苦,中道是节制,过度是放纵,而不及是冷淡”等等。亚氏人为,如同“锻炼过多或过少都会损害体力,过多的饮食和过少的饮食会损害健康”一样,“德性总是被过度或不及所破坏,只有中道才能保持、维系他们。”<sup>[7]</sup>

从孔子对中庸和亚里士多德对中道的解释来看,意思存在着基本的一致。即指行为的适中,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同在于

孔子的中庸强调人们的行为约束的界限,君子应该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适中,孔子的中庸是仁与礼的和谐统一,“仁”是处理人与热闹关系和做人的最高准则,“礼”则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既定原则和客观标准。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原则则是认为国家的政治统治和人的德性都要追求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状态。“在政治学中,他援引了自己著作《伦理学》,并指出伦理学是政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sup>[8]</sup>因此,亚里士多德正论证了国家中应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政治社会最好,他说:“惟有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府。”<sup>[9]</sup>这正是其中道思想在其政治理念中鲜明地现。

## 三、中庸与中道思想的内容比较

### (一) 孔子中庸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庸思想作为中国古代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孔子极为倡导的道德规范。孔伦理思想中的孝悌、忠恕、智勇、信义等道德之和諧统一就在与中庸的原则。孔子中庸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过犹不及的思想。过犹不及的思想是孔子中庸的基本思想,同时有强烈地反映出人类的理性精神。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sup>[10]</sup>狂狷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孔子认为,人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应当时时保持一种理性状态,既不偏于狂,也不偏于狷,于两端之间取其中。《论语》载: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sup>[11]</sup>这里,过和不及也是相反的两极端,孔子认为它们同样不好,惟有无过无不及方为具有理性精神的“中正之道”孔子认为,遵循中庸的行为准则就应该做到不偏不倚,同时要求君子的道德修养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主张“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sup>[12]</sup>“君子贞而不谅”,同时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sup>[13]</sup>是说质朴多于文采,就显粗野;文采多于质朴,又显浮华,既有文采又不浮华,才是君子应该具备的美德。

第二,时中的思想。按照事物的本来面去认识就是时中。孔子认为,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随时间、条件的不同而变化。《礼记·中庸》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也。”这句话明确提出了“时”与“中”的关系,指出“中”是随时而中,因时而中,是根据时机的变化,审时度势,灵活地、适度地处理问题,而不是不分场合、不讲条件的随意折中。然而,随时机和场合的变化,怎样才算恰当、适中,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执者于一个凝固不变的“中”,就会走向极端,失去了“中”的意义。因此,孔子中庸的时中思想体现的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应该顺应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目标和方向,使思想和行动始终保持在和谐适中的状态。即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要始终保持与日俱行,与时俱化。

第三,中庸为德的思想。“中庸之为德”便是孔子确立的修身养性、主中致和的德行之道,认为中庸之德是天下最好的德性。这种中庸之道在个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即是要达到“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sup>[14]</sup>在孔子看来,“中和”不单是天下之大本,也是天下之达道,能“达道”者,便能“极高明而道中

庸”。所谓“极高明”，即指通晓义理和尽心养性、知天知命的精神境界；“道中庸”即指从事人世的的活动，遵循五伦规范，行为符合中道。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君子德性修养的最高境界了。在《论语·尧进》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就是孔子在教育学生上对大胆好胜的子路以抑制，对胆小退缩的冉求以鼓励，使他们达到中庸之德。

#### (二) 亚里士多德中道原则的主要思想

第一，适中的思想。“人们应该选取中道，既不过度，也非不及。而中道是由正确的原理来表述的……在我们所说的品质中，正如其他事物一样，都有一个目标。具有理性的人，或者急迫或者迟缓些，总是以它为归向，中道就是过度与不及的居间者。”<sup>[15]</sup> 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有欲望、情感和行为，于是就有三种可能：过度、不及和适中。人人都有欲望，人人皆有情感，如果处理不当不能达到适中，便是恶的表现，适中或适度是德性的特征，中道即德性。

第二，相对中道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中点(中道)有两种：一种是事物中的绝对中点，它对一切人都是同一的(如2与10之间的中点是6)；另一种是相对于我们的中点，它对于一切人并非同一(如一千克食物为少，五千克为多，但三千克并非对一切都适当，对于专业运动员还是少了，对于体操初学者它却多了。<sup>[16]</sup> 亚里士多德中道思想不是指第一种(绝对的中点)，而是“相对的中道”，是指“因人而异的适度要求或状态”，“是指不太多，也不太少，因人而异的。”<sup>[17]</sup> 亚氏看来，中道是随人随事，因地因时变动不居的，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尺度和标准衡量它。所以，中道只是对应该的对象，在应该的事件，于应该的地点和应该的时间，以应该的方式来行动来感受。

第三，合乎理性的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是人类灵魂的最高贵部分。无论在个人行为还是在城邦生活中，过与不及都不合乎理性，也不能培养善德和达到幸福，要达到幸福必须运用理性，而合乎理性的要求就在于合乎中道。“道德德性的使命恰恰就是节制享乐，赋予享乐以完善的形式，在快乐和痛苦之间划出界线，使他们服从于理性的呼唤。”<sup>[18]</sup> 这种理性的呼唤便是遵循中道的原则。“中道在两种过错之间，一方面是过度，一方面是不及。它之所以这样，因为它就是对情感和行为中的中间的命中。”<sup>[19]</sup> 他认为：“我们的航线必须避开所有面临的恶事而航行在中间”<sup>[20]</sup>，这需要理性的力量，只有理性才能保证。

由上述可见，孔子的中庸与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从内容上都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就是“过犹不及”。他们都认为美德是在适中的情况下，超过或不及都不能算美德。孔子注意对立面的统一，反对过于极端，从两端入手解决问题，他重视把握适度“乐而不淫，哀而不伤”<sup>[21]</sup> 都是节制两端过与不及而取中庸，亚里士多德认为由激情所引起的行动有“过”、“不及”和“中道”三种状态，其中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只有“中道”才是最好。所以美德就在于舍两极而执其中，这就是中庸之道。所不同之处在于，亚氏强调用理性来控制 and 调节自己的伦理行为，自始至终保持适中。孔子的中庸思想是以“礼”作为既定原则和客观标准，亚里士多德则把“公正”和“法律”作为是否合乎中道的标准。因此二者的差异

分别影响了我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走向使我国成为一个以德治为主的国家，而西方则发展成为以法治为主的国家。

## 四、中庸与中道实现途径

### (一) 孔子中庸的基本路径

孔子认为，要达到中庸至德，必须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sup>[22]</sup>

“毋意”，就是依据客观实际来进行认识活动。这里包含客观第一的唯物论因素和主客观相统一的辩证思想。“毋意”就是要反对思维决定存在错误思想，要遵循客观先于主观，物质先于意识的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的认识活动的正确性。

“毋必”，朱熹认为是指全面地、一分为二地、灵活地看问题。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sup>[22]</sup> “叩其两端”要求的就是在观察问题时保持一种全面的态度。“执两”才能“用中”，如果只重视“用中”，而抛弃“叩其两端”，就是“必”的表现。

“毋固”中的“固”，朱熹解释为“执滞”。“毋固”就是不要执滞，不用静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处理问题。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也。”<sup>[22]</sup> “麻冕”是从前一贯的礼，但与“纯冕”相比，后者更合乎实际，因此，虽做修改，不仅无伤其礼，反而更值得提倡，这便是“毋固”思想的体现。同时，“毋固”与“权变”是统一的，是“毋固”的具体表现之一。

“毋我”，是指不自以为是，要求道德主体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是正确对待人我关系的一种原则。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责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sup>[23]</sup> 又说：“无求备于一人。”<sup>[24]</sup> 是从局域的“我”延伸到开放的“人”的具体主张。

在做到“四毋”的同时，还须尽“诚”用“信”才能实现中庸的目的。正如《中庸》所言，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诚”是实践中庸伦理目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实现理想人格，践行中庸之道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信”。孔子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sup>[25]</sup>，因此，诚信之于中庸之道，既是一个初级阶段，也是一条必由之路。

### (二) 亚里士多德实现中道的具体方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的命中是困难的，因为错误是多种多样的，而正确只有一种。他晓谕人们，发现情感和行动的中道是一项需要技术和熟练的事业。他建议：

第一，在过度与不及两个极端中，首先应当避开与中道更加对立的极端。在两个极端中，一者危害更大，另一者危害较小，则两恶相权取其轻。比如，在鲁莽和怯懦之间，就必须克服怯懦，因为它比鲁莽离中道的勇敢更远。

第二，应当注意自己的偏好，避免自己更容易陷入的极端。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必须努力背着我们的偏好去做；因为善于避免错误，才会走上中道，这有如我们使弯棍变直的方法。”<sup>[26]</sup> 他指出，凭借出现于我们之中的快乐和痛苦，我们可以得知我们本性上所倾向的目标，若我们将自己拽往相反的方向，我们就会避免失误，而达到适中。

第三,理智是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思辨是最好的现实活动。思辨和德性发生着重要的联系,智慧、公正、节制等德性与思辨活动相辅相成。亚里士多德认为,思辨而致中庸之德,而中庸之德又能促进更高层次的思辨。于是,亚氏不禁高呼:“思辨乃是最高幸福”。如果说习惯是铁路,思辨是快车,我们就能通过思辨的快车直驶目的地——中庸之道。

在分析两种实现中庸的途径后,我们发现,孔子讲“四毋”,亚氏讲“三条方法”,孔子重“诚、信”,亚氏重“思辨”;孔子的“四毋”说的是“不要怎么做”,亚里士多德的“三条方法”直截了当地告之:“照这样做!”前者似乎给了道德主题更宽泛的空间,后者则更严谨精确。不难看出,孔子是在要求道德主体从内向外剔除反中庸的东西,而“从容中道”,亚氏则是由外向内培植一些中庸的东西,而“易于达到中道。”

### 五、中庸与中道对后世的影响

中庸思想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思想,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达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被历代统治者广为利用。汉代大儒董仲舒继承孔子中庸并发展为“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于和,而所为有功;虽有不中者,必止于中,而所为不失。”<sup>[27]</sup>到了宋明时期理学进一步把中庸注释为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周敦颐说:“唯中也者,和也。中节者,天下之达到也。”<sup>[28]</sup>朱熹强调“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性,即理也,”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庸》第一章),二程说:“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思想中原本的辩证法思想几乎消失殆尽,而其中保守消极的因素却被发展,成了一种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消极人生理论。这也是鲁迅先生力抨中庸的原因所在。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由于其中的神秘化倾向,而被后来的中世纪神学所利用。中世纪著名伦理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就是打着解释和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招牌,曲解亚氏的理论。“他使神学转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极其所提出的整个知识系统化的基础上,托马斯的目的是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sup>[29]</sup>托马斯·阿奎那利用亚氏理论建立了他完整的神学体系,用以适应中世纪神学统治的需要。

当然,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必然受到社会经济

关系的制约,在阶级社会中,它必定为一定的阶级统治服务。而孔子的中庸和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是东西方共有的文化遗产,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应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通过对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中庸思想的比较研究,继承中西方中庸思想的精髓,摒弃其保守消极的因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必将为我们当前建设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产生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 [参考文献]

- [1][2][8][18][20][29]刘献洲译.西方伦理学简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41、153、119、146、140、266.
- [3]朱熹.论语集注·雍也[M].
- [4]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齐鲁书社出版,1979.14.
- [5]唐凯麟.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4):58.
- [6]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VIII[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 [7][16]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104a10—25,1106b3—4.
- [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06.
- [10][11][12][13][14][21][22][23][24][25]论语:子路·尧进·卫灵公·雍也·尧曰·八佾·子罕·述而·微子·卫灵公[M].
- [15][19]苗力田译.尼各马可伦理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14,38.
- [17]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上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14.
- [26]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M].商务印书馆,1987.304.
- [27]春秋繁露·循天王道[M].
- [28]通书·师[M].

(责任编辑:杨 睿)

## Comparative research into Doctrine of Mean and Mean Thought

PU Jian - b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China's Confucius and Greece's Aristotle put forward common Thought of Doctrine of Mean and Mean Thought at similar historic time respectively, which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world cultural thought development. In today's construction of well-off all-round society and harmonious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is 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human history in terms of its aspects of the producing cause, connotation, content, realizing path and its influence on future generations in order to fully absorb its essence and to make ancient ideas serve present people and to make foreign ideas serve Chinese people.

**Keywords:** Confucius; Aristotle; Doctrine of Mean; Mean Thought